

maginist

Les intellectuels et la politique de l'esprit dans l'histoire européenne



何谓欧洲知识分子

欧洲历史中的知识分子和精神政治

法兰西学院
欧洲讲坛

[德] 沃尔夫·勒佩尼斯 —— 著 李焰明 —— 译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Qu'est-ce qu'un intellect.

何谓欧洲知识分子

欧洲历史中的知识分子和精神政治

[德] 沃尔夫·勒佩尼斯 —— 著 李焰明 ——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Qu'est-ce qu'un intellectuel européen?

by Wolf LEPENIES

© Editions du Seuil, 2007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1

All Rights Reserved.

法国瑟依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20-2007-142 号

Cet ouvrage a bénéficié du soutien des Programmes d'aide à la publication de
l'Institut français /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et européenne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何谓欧洲知识分子：欧洲历史中的知识分子和精神政治 /

(德) 勒佩尼斯著；李焰明译，—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6

ISBN 978-7-5495-0507-4

I. ①何… II. ①勒… ②李… III. ①知识分子—研究—欧洲

IV. ① D750.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72065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开本：960mm×670mm 1/16

印张：25 字数：320千字 图片：3幅

2011年6月第1版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39.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序言 / 1

第一讲 乌托邦的终结与忧郁的回潮:对旧大陆知识分子的审视 / 11

一、信念的起源与终结 / 12

二、具有坚定信念的人与多愁善感的人 / 18

三、旧大陆的知识分子 / 23

第二讲 乌托邦思想与忧郁症 / 30

一、伯顿与《忧郁症的解析》 / 30

二、乌托邦与禁止忧郁 / 38

三、忧郁症与权力 / 45

四、宫廷与沙龙 / 49

五、资产阶级的忧郁:18 世纪的德国 / 59

六、社会与孤独 / 61

第三讲 无聊产生之地 / 66

一、引言 / 66

二、乌托邦:没有烦闷也没有忧伤 / 71

三、贵族沙龙和资产阶级沙龙 / 74

四、内在性与内部 / 80

五、追忆似水年华 / 86

六、保尔·瓦莱里与泰斯特先生 / 90

第四讲 禁止行动与思考之弊害 / 93

一、思考与忧郁 / 93

二、行动者与思想者:拉罗什富科 / 100

三、德国资产阶级:不受权力约束的忧郁 / 105

第五讲 博物学和自然史:现代性之初 / 114

一、引言 / 114

二、从博物学到自然史 / 119

三、从疾病分类学到疾病史 / 131

四、拉瓦锡时代:期刊作品 / 139

五、科学革命和政治革命 / 143

六、走向后历史 / 146

第六讲 词与物:布丰 / 149

一、风格即人 / 149

二、布丰的对手:林奈 / 155

三、博物史和文学 / 161

第七讲 一位算得上是诗人的科学家:温克尔曼与艺术史的创立 / 168

一、缩略本流行的时代 / 168

二、命名与分类 / 169

三、艺术史的创立 / 177

四、“不管是否愿意,他必定是一位诗人” / 182

第八讲 社会科学之初:人类学家和作家格奥尔格·福斯特 / 187

一、旅行家和观察家 / 187

二、理性和感性 / 192

三、我们珍贵的文学骑士 / 196

四、康德的批评家:福斯特 / 204

五、启蒙时代的怀疑论者 / 207

第九讲 社会学之初：卡尔·冯·林奈和《天谴》 / 211

一、实验神学 / 211

二、《天谴》就像生命感悟 / 213

三、礼帽党和便帽党：林奈时代的瑞典 / 216

四、物理神学与神正论 / 220

五、自然政治学与经济学 / 223

六、凌驾于其他所有生物之上的生物？ / 227

七、社会起源 / 230

八、林奈所回避的道路：马尔萨斯和亚当·斯密 / 234

九、博物学、伦理学和社会学 / 236

第十讲 科学的起源和道德的丧失 / 240

一、开篇 / 240

二、以自然之名的一场革命 / 241

三、人化自然的美 / 243

四、人的特殊位置 / 246

五、科学道德的丧失 / 248

六、自然的历史化 / 250

七、向进化论的过渡 / 254

八、一个愚蠢的时代的信念及存在的问题 / 257

第十一讲 19 世纪的知识分子教会：圣伯夫及其他 / 261

一、开篇 / 261

二、忧郁的典范：拉罗什富科 / 262

三、博物史观照下的文学 / 268

四、文学是报复 / 280

五、幽居隐修院的工作者 / 284

六、知识分子的教会 / 289

第十二讲 20 世纪的知识分子教会：

从马修·阿诺德到卡尔·曼海姆和朱利安·班达 / 294

- 一、诗人与批评家:马修·阿诺德 / 294
- 二、马修·阿诺德与圣伯夫之间的文学友情 / 302
- 三、有关知识分子历史的一个重要概念:知识阶层 / 305
- 四、德国的学者和法国人的脑袋 / 310
- 五、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 312
- 六、朱利安·班达:知识分子的背叛 / 316

第十三讲 德国知识分子的背叛:

如此甜蜜的合作(1.法西斯主义) / 322

- 一、法国与德国:婚约 / 322
- 二、戈特弗里德·贝恩的生平和著作 / 324
- 三、一种不问政治的艺术的变质 / 333
- 四、欧洲知识分子的希望和背叛 / 340

第十四讲 德国知识分子的背叛:

如此甜蜜的合作(2.共产主义) / 345

- 一、被窃取的革命 / 345
- 二、“多亏你们,我们建立了统一的德国” / 349
- 三、共同体的梦想与敏感的美德 / 351
- 四、大迁徙的结束和新的思想混乱 / 353
- 五、政治神学和实用政治 / 359

第十五讲 未来:旧大陆知识分子与欧洲统治的结束 / 363

- 一、概述 / 363
- 二、多样化的欧洲 / 364
- 三、“历史终结”之神话的终结 / 369
- 四、移民时代与文化的可译性 / 372
- 五、罗西尼和桑格尔 / 377

译名对照表 / 382

序 言

门锁难以打开。但是,新任教授将渐渐学会如何用一个诀窍来开门。狭小的房间所配备的旧家具依然保留着 50 年代的魅力。这些旧家具看上去很不牢靠,以至我不敢一屁股坐在办公桌旁的椅子上。桌上堆放着各种会议的正式汇编。在浏览了之前来作讲座的人和同事的大名后,我要在这上面添上自己的名字,还真有点犹豫。房间的一角,有一个极小的洗手盆,我可以在那里洗手,刷去西装上的灰尘。房间管理员走了过来,他通常穿一件简便的西服上装和一件领口敞开的衬衫,尽管神态严肃,但仍然可以想象他在自己的家里也应该是这样穿着的。管理员向演讲人瞥上一眼,向前走几步,打开会议厅的门,并通报:“教授先生请!”我们现在是在法兰西学院。

当多米尼克·塞格拉尔(Dominique Ségald)建议我在瑟伊出版社出版我于 1992 年作为法兰西学院欧洲讲坛教授所作的系列讲座时,我又惊又喜。惊喜之后,是一种怀旧感。我的思绪回到了 1992 年 2 月 21 日那天,当时,我在马尔塞兰—贝尔特洛席位上作首次讲座,即就职演讲,有许多知名的法国同事在场,我是我的朋友哈拉尔德·魏因里希(Harald Weinrich)的继任者,他是 1989 年建立的欧洲讲坛的首位教授。我回想起 2 月 21 日那天晚上,讲座之后,我妻子和我,与乔治·康吉扬(George Canguilhem)、康吉扬夫人(Mme Canguilhem)、皮埃尔·布迪厄^①在巴尔扎尔餐馆共进晚餐。皮埃尔·布

^① 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0—2002),当代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法兰西学院社会学教授,著述达 340 余种,涉及人类学、社会学、教育、历史、政治、哲学等领域,主要有《阿尔及利亚的社会学》、《背井离乡》、《艺术法则》等,其影响遍及世界。——译注

迪厄是乔治·康吉扬的朋友,而乔治·康吉扬则是我的榜样。当看到通常有点神经质和易激动的皮埃尔·布迪厄在乔治·康吉扬面前显得十分平静,像一个年轻人抬眼尊重地注视着一个人受人仰慕的成年人时,场面很动人。那天晚上,具有伟大传统和伟大现代性的法国学者在我们的餐桌用晚餐。

1530年,在皇家图书馆馆长纪尧姆·比代(Guillaume Budé)的建议下,弗朗索瓦一世建立了法兰西学院,它是几百年以来威望不断增长的最著名的欧洲科学机构之一。我们有理由说,在法国文艺复兴中,只有很少的事件能像这个学院的创建那样对文明的发展产生持久的影响。学院建在巴黎,昔日的康布雷学院和特雷吉尔学院也建在那里。然而,学院的建筑物始终与其主人的知识地位不相称,也与其主人所追求的东西不相称。当比代建议国王把附近一些享有盛名的房屋划给在索邦神学院附近的这所新学院时,国王加以反对:他不怎么关心学院的建筑,更多地希望把新学院建立在组成新学院的人选之上。之后,建筑物的这种匮乏成为常态,并且最终成为一个特色。事实上,法国人自豪地指出,克洛德·贝尔纳^①也没有固定的实验室,贝尔纳的实验室只有一个人,进行的却是第一流的研究,而德国人声称作研究需要设备齐全并配有许多合作者的大型研究机构。同样,始终充满热情的朱尔·米什莱^②,既赞叹法兰西学院,又对其可怜的建筑物和阴暗的小院子感到惊讶。

这样的迷恋已有很长时间不复存在了。持续不断的整修已经大大地改善了法兰西学院的建筑。看到政府积极参与其中,德国人深受感动。弗朗索瓦·密特朗在法兰西学院的现代化中发现了他的建设策略的基石,尽管这种建设策略并不总是令人信服,但它赋予巴黎

① 克洛德·贝尔纳(Claude Bernard, 1813—1878),现代实验生理学的创始人,是他那个时代法国重要的生理学家。——译注

② 米什莱(Jules Michelet, 1798—1874),法国历史学家,认为历史就是人类反对宿命、争取自由的斗争史。主要著作有《法国史》、《法国革命史》等。——译注

一种新的独特面貌,不失为宏伟。但我希望法兰西学院的学院习惯没有任何变化。学院习惯是古老的,并不缺乏自嘲,也并不缺乏有力的证据。作为新任命的欧洲讲坛教授,我无法抵抗入院典礼的魅力:我将进入由未来的同事所构成的团体中。事实上,我所要做的是站在会议厅唯一空缺的座位后面,倾听学院理事以共和国总统的名义宣读任命书,然后在听到“先生,请坐在我们中间”的邀请后入座。在学院的精英界和以民主方式形成的听众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别,听众中有学生,也有在冬天找一个暖和地方避寒的流浪汉,还有资产阶级贵妇以及气质优雅的退休夫妇,他们各自做着笔记,这就是受宠的报告人想象中的场面,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他们认真地比对笔记的内容。

法兰西学院的座右铭可能是泰莱姆修道院的“做你想做的事”!当然,每个讲坛的教授只能以有限的方式做你想做的事。他必须授课,有规定的课时数。但是,授课不能重复。绝对不能重复。年复一年,教授们就是在承担可能带来的风险的同时,在进步的轨迹中进行研究。在法兰西学院内,科学处在永恒的运动之中。欧内斯特·勒南^①提到,法兰西学院致力于“正在形成中的”科学。在这里,正如符号学院士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以诗意的方式所说的,研究的进展在想象中实现。

在法兰西学院,我没有理由胡思乱想,因为我不好断定自己的研究是否超越了前人。但是,在我讲课的时候,我能激起听众的反应、批评和问题。这是从一个新的角度对一些问题重新思考的机会——这些问题曾长期困扰着我,而且是用一种既陌生又熟悉的语言进行思考,因而为我展现了新的研究视角。

我的讲座主题是“欧洲历史中的知识分子和精神政治”。在讲座的第一阶段(从第一讲到第四讲),我讨论知识分子的经典困境,正如一个名叫尤利西斯的人航行在卡里布德和西拉之间,知识分子也可

^① 勒南(Ernest Renan, 1823—1892),法国19世纪著名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宗教学者,著有《勒南散论》。——译注

能逆风航行在忧郁症和乌托邦之间。我在这些讲座中将重新考察我的博士论文的主题(1969年第一版):忧郁症与社会^①。我发现知识分子天生就是一个忧郁症患者,知识分子意识到自己无法使其理想具体化,因而陷入一种隐性的忧郁症中,或者躲藏在一个美好的想象世界的乌托邦中。不管是取得政权,还是仅仅成功地接近政权和对政权施加影响力,知识分子都屈从于自以为能支配这个美好世界的危险诱惑。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思想的起源之一,而且也是极权主义行为的起源之一,20世纪造成大量死亡的意识形态可以作证。

问题不在于主题的悦人,不过,我准备以一种冷静的态度来对待这些主题。这些主题与我的职业有着某种关系。我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新泽西)度过了几年,1989年担任柏林科学院院长职务。1989年的动乱(这也是战后欧洲最可怕的动乱)之后,我致力于在中欧和东欧建立类似于柏林科学院的研究机构。布达佩斯研究所、布加勒斯特新欧洲研究所、圣彼得堡古典图书馆,以及索菲亚高级研究中心(CAS)就这样建立起来了。我抓住机会,带着瑞士诗人哥德弗里德·凯勒(Gottfried Keller)所理解的某些观念建立了一些研究机构,哥德弗里德·凯勒认为,与其抱怨和强求不可能的东西,不如带着快乐实现可能的东西。作为幸运的知识分子,我因此摆脱了乌托邦和忧郁症的困境,我在法兰西学院的讲座中把这种困境当作主题。

我的讲座的第二阶段(从第五讲到第九讲)是关于从博物学(l'histoire naturelle)到自然史(l'histoire de la nature)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转折点上完成的。我在拙著《博物学的终结》中,以及与瑞典哲学家和作家拉尔斯·古斯塔夫逊(Lars

^① *Melancholie und Gesellschaft* (《忧郁症与社会》), Francfort-sur-le-Main, 1969, 已译成英文、意大利文和日文。

Gustaffsson)合著的德文版著作《林奈的〈天谴〉》中讨论了这个问题。^①我在另一部不同的著作《18世纪的作家和科学家》中以个人肖像的形式描述了历史思维的这种发展。在我的讲座期间,我也涉及布丰和格奥尔格·福斯特,温克尔曼和林奈^②。在这样做的时候,从博物学到自然史的变化被文学生产和科学生产之间的竞争问题掩盖了。在作为社会学家的我看来,这种紧张现象是我的学科的特征。这是我的著作《三种文化:在文学和科学之间的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这部著作的法文版于1990年出版,书名叫做《三种文化,在科学和文学之间:社会学的出现》^③。

讲座的第三阶段,即最后阶段(从第十讲到第十五讲),我讨论了欧洲知识分子的精神政治,这是保尔·瓦莱里^④所理解的狭义上的用语。在那里,我的出发点基于这样一个事实:现代科学(我把现代科学的代表描述为“有坚定信念的人”)是以其成就为代价和通过“道德的丧失”完成的。笛卡尔曾经界定为“预先道德”的东西已经成为现代科学的永恒特征。我后来在一部叫做《行为与认识》^⑤的著作中重新讨论了这个主题,在那里,我为向科学价值的回归辩护。

① *Das Ende der Naturgeschichte*(《博物学的终结》), Munich, Hanser, 1976, 已译成意大利文和日文; Carl von Linné, *Nemesis divina*(《林奈的〈天谴〉》), éd. Wolf Lepenies et Lars Gustafsson, trad. Ruprecht Volz, Munich, Hanser, 1981, 已译成日文。

② *Autoren und Wissenschaftler im achtzehnten Jahrhundert. Buffon, Linné, Winckelmann, Georg Forster, Erasmus Darwin*, 《18世纪的作家和科学家:布丰,林奈,温克尔曼,格奥尔格·福斯特,伊拉斯谟斯·达尔文》, Munich, Hanser, 1988(已有意大利文版和日文版)。

③ *Die drei Kulturen. Soziologie zwischen Literatur und Wissenschaft*(《三种文化,在科学和文学之间:社会学的出现》), Munich, Hanser, 1985; trad. fr.: *Les Trois Cultures. Entre science et littérature: l'avènement de la sociologie*, trad. Henri Plard, Paris, Éd. de la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 1990。

④ 瓦莱里(Paul Valéry, 1871—1945),法国诗人,评论家,受象征派诗人马拉美等影响,诗篇富于哲理和想象,主要作品有长诗《年轻的司命女神》、《幻美集》及《杂文集》(5卷)。——译注

⑤ *Benimm und Erkenntnis*(《行为与认识》), Francfort-sur-le-Main, Suhrkamp, 1997。

在讲课的过程中,我的着重点是精神政治的历史。圣伯夫^①是这些讲座的中心点,我在对这些讲座进行概述的时候,这个人物使得以重新组织这些课程的基本思想。因为在圣伯夫那里,知识分子的先天性忧郁症倾向所起的作用与文学和科学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文学批评对博物史模型的定向同样重要,博物史曾引导法兰西的伟大批评形成一个“文学自然史”的计划。在这一年的讲座中,圣伯夫引发了我的兴趣,与圣伯夫的最初比较使我得以发表我的著作《圣伯夫:现代性之初》^②。此时,与法国科学家的接触是富有成果的和激励人的,我援引其中的杰拉尔·安托万(Gérald Antoine),他向我指出了研究像圣伯夫那样的人物的方式。同样,朱利安·班达^③和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在我的历史思考中占据着一个中心位置,在另一部著作中,我谈了受到1989年动乱影响的当代欧洲的主题^④。当然,在这些讲座中,现实性没有被遗忘,借这个机会,我应该特别关注我自己的国家:德国。在欧洲国家,只有德国的知识分子受到20世纪两种主要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即相继取得政权的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法兰西学院讲学期间,我在一本小书中描述了知识分子介入这两个政权给两个德国带来的后果^⑤。

我坚持不懈地把听众的注意力引向我的系列讲座的思路:法国

① 圣伯夫(Sainte-Beuve, 1804—1869),法国文学评论家。他是将传记方式引入文学批评的第一人,著有《文学肖像》、《当代肖像》、《星期一谈话》等。——译注

② *Sainte-Beuve. Auf der Schwelle zur Moderne* (《圣伯夫:现代性之初》), Munich, Hanser, 1997; trad. fr.: *Sainte-Beuve. Au seuil de la modernité*, Paris, trad. Jeanne étoré et Bernard Lortholary, Gallimard, 2002.

③ 朱利安·班达(Julien Benda, 1867—1956),法国哲学家、小说家,著有《知识分子的背叛》等。——译注

④ *Aufstieg und Fall der Intellektuellen in Europa* (《欧洲知识分子的兴衰》), Francfort-sur-le Main, Campus, 1992 (également en portugais et en roumain). À l'origine du livre se trouvent des conférences données à Rome qui avaient été publiées un an auparavant en italien: *Ascesa e declino degli intellettuali in Europa*, Rome/Bari, Laterza, 1992.

⑤ *Folgen einer unerhörten Begebenheit. Die Deutschen nach der Wiedervereinigung* (《根据一个闻所未闻的事件:重新统一后的德国人》), Berlin, Siedler, 1992 (也有意大利文和瑞典文版)。

对德国的态度,以及德国对法国的态度。事实上,不仅有“一种法国思想的德国危机”,正如克洛德·迪容(Claude Digeon)以一种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方式所描述的,也有“一种德国思想的法国危机”。这些危机在我的讲座里起着中心作用。关于这些危机,我写了一本书,书名是纲领性的:《危险的选择性亲和力》^①。雷蒙·阿隆^②欣赏马克斯·韦伯^③,也许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感受到这些选择性亲和力的危险。我曾因翻译了一些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著作在巴黎被授予雷蒙·阿隆奖,那是在纪念阿隆诞辰 100 周年的时候,我再一次利用这个机会向他表示敬意,我很高兴能当着他的女儿多米尼克·施纳贝的面向他表示敬意。^④在法兰西学院所作的讲座中,我只能简要地提及法德文化战的主题,法德文化战深深地影响了我们两个国家的历史。相反,我在最初用英语撰写的一部著作(用英语撰写显得有些不合常理)中,用了整整的一章来讨论法国人和德国人之间的“文化战”,这里援引的是朱利安·班达的说法^⑤。

就个人而言,我并不得益于法国和德国之间的战争,而是得益于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和平。我成长在法国人和德国人和解的年代,当时,戴高乐和阿登纳建立了协作关系,这看起来仍然是一个奇迹和一份礼物。在我的祖父看来,他还能够目睹的这种和解是不可想象的,我的父亲也始终认为这种和解是不可思议的。在我这方面,我体验到法德关系的正常化和危机。人们有理由思忖,以前作为欧盟发动

① *Gefährliche Wahlverwandtschaften. Essays zur Wissenschaftsgeschichte*, Stuttgart, Reclam, 1989(《危险的选择性亲和力:论科学史》),也有波兰文和日文版。

② 雷蒙·阿隆(Raymond Aron, 1905—1983),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报刊专栏作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自由法国》杂志主编,著有《社会学思想的主要流派》等。——译注

③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德国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参与了魏玛共和国宪法的起草设计。《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他最重要的著作。——译注

④ «À l'ombre de la sociologie allemande»(“在德国社会学的阴影下”), *Le Monde*, 2005 年 3 月 13 日。

⑤ *The Seduction of Culture in German History*(《德国历史中文化的诱惑》),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机的法德二轮马车在最近这些年里是否阻碍了一体化过程。这一切都不会减少我对法国的仰慕,也不会减少我对在法国的种种经历的感激之情。在这些美好的经历中,有我与总理领导的旨在为法国教育体系的改革提出建议的“弗吾委员会”(Commission Fauroux)的合作^①。正是在那个时代,文化认知的国别差异突然呈现在我面前:作为德国人,说到“教育体系改革”,我们立即会想到洪堡和大学,而法国人想到的则是于勒·费里(Jules Ferry)和中小学。难以忘怀的是,我们的委员会设在一所学院的楼里,而法国著名的日耳曼语学者查理·安德勒(Charles Andler)以前就住在那里。将近一个多小时,我的同事们相互争论,不知道文件中有一个字眼是“共和国”还是“国家”。这个时候,我发言了,略微有点嫉妒和思乡的情绪,指出法国人之为争论的这两个词语差不多已经完全从德文词汇里消失了。

除了研究机构,我还要向研究者表达我的感激之情。由于皮埃尔·布迪厄的建议,我得以在法兰西学院任职。他是我的朋友,尽管我们没有机会经常相互见面。我钦佩他在社会学领域的直觉。他的早逝对社会科学是一个巨大的和不可挽回的损失。^②

在我看来,巴黎大学的伟大传统体现在乔治·康吉扬的身上,他是巴黎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所主任加斯东·巴舍拉尔^③的继任者,显然,在法国之外,甚至在法国,他是战后最被人低估的“解读大师”。在许多年里,我有幸能够经常、定期去他在玛丽-勒鲁瓦的住所拜访他,并在那里经常遇见接替他在巴黎大学职位的苏珊娜·巴舍拉尔(Suzanne Bachelard)。在我看来,乔治·康吉扬是欧洲产生的最重要的科学历史学家之一。独创性和精确性的结合是他的研究的特点,

① Voir Roger Fauroux (dir.), *Pour l'école* (《为了学校》), Paris, Calmann-Lévy, 1996.

② Wolf Lepenies, « Un bricoleur doué » (沃尔夫·勒佩尼斯:“有天赋的家中修理工.”), *Le Monde*, 26 janvier 2002.

③ 加斯东·巴舍拉尔(Gaston Bachelard, 1884—1962), 法国哲学家, 其最重要的著作是关于诗学及科学哲学。——译注

唯有他才具备这种特点。我能认识这位伟大的科学家,认识论学者,同时也是一位有道德的、廉洁和正直的人,是一件愉快的事,他是抵抗运动的勇敢成员。乔治·康吉扬不仅仅是一位解读大师,而且也是一位“阅历丰富的大师”。在由弗朗索瓦·埃瓦尔德(François Ewald)组织的关于米歇尔·福柯^①的研讨会上,他来到柏林科学院。我还记得,有一些年轻学生和助手虽然仅通过其著作了解他,但仍然感受到一种令人难忘的人格力量。在德国,我试图让更多的公众了解乔治·康吉扬的著作,但收效甚微。^②今天,当我看到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柏林科学史小组一群年轻研究者在一些受人瞩目的著作中向他表示感激之情时,我尤其感到欣慰,他们对乔治·康吉扬有着深刻的印象,并受到他的影响^③。

在巴黎,我在人文科学研究所度过了大部分时间。难以忘怀的是,我在那里遇到了克莱芒·海勒(Clemens Heller),他最初是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助理,然后接替他担任该所的所长。克莱芒·海勒是奥地利人,在国家社会主义统治时期,他被迫去了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从美国回来,在法国全身心地投入到研究现代社会科学中。他从来没有忘记向他的客人和朋友提到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地址的象征性意义,该所位于拉斯帕伊路和歇尔西米底路的街角处,前面耸立着关押过德雷福斯上尉的军事监狱;盖世太保就在那里审讯和折磨被捕者,直到把他们弄死;对面是路特西亚医院,今天,医院仍然在那里,战争期间,德国将军在那里过着舒适的

① 米歇尔·福柯(Michele Foucault, 1926—1984),法国哲学家、思想系统的历史学家,著有《癫癲与文明》、《临床学的诞生》、《性史》等。——译注

② Voir Georges Canguilhem, *Das Normale und das Pathologische*(《常态与病态》), éd. Wolf Lepenies et Henning Ritter, Munich, Hanser, coll. « Hanser Anthropologie », 1974 ; Id., *Wissenschaftsgeschichte und Epistemologie. Gesammelte Aufsätze*(《科学史与认识论文集》), éd. Wolf Lepenies, Francfort-sur-le-Main, Suhrkamp, 1979.

③ Voir Cornelius Bock, Volker Hess, Henning Schmidgen (dir.), *Maß und Eigensinn. Studien im Anschluß an Georges Canguilhem*(《节制与固执:关于乔治·康吉扬的研究》), Munich, Wilhelm Fink, 2005.

生活。

雨果·冯·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1906年写了一篇关于克莱芒·海勒的父亲的小文章(《致书商克莱芒·海勒的信》)。在不知晓的情况下,霍夫曼斯塔尔也写了一个关于儿子克莱芒·海勒的剧本。想要很好地理解克莱芒·海勒这个人,应该读一读他的喜剧《难以相处的人》。克莱芒·海勒内心深处始终是一个有同情心的无政府主义者,当他置身于文明中的时候,他热爱人类,他不遵守他以前没有得到证实的规则。他和所有人一样,有自己的习惯,但是,墨守成规对他来说是一个陌生的词语。他的妻子玛丽一路易斯·迪夫尔在出版界工作,在妻子的支持下,他以他的全部精力促进社会科学。在科学研究机构的建立和运行方面,没有人像他那样给予我这么多的启发。在他看来,科学和文化的欧洲在1989年之前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实体,他也坚信,不应该把欧洲封闭在欧洲中心主义里,而是应该让欧洲保持活力,与整个世界进行接触。

“精神政治”:在我看来,这种说法不是一个学术主题,更多的是一种具体经验——当我与那些我对之感激不尽的人在一起时的一种具体经验。在法国,我要感谢的首先是皮埃尔·布迪厄(1930—2002),乔治·康吉扬(1904—1995)和克莱芒·海勒(1917—2002)。

对于我的系列讲座的文本,我在有的地方进行了一些删减,插入了一些我认为能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注释,改正了一些错误,并增加了一些有关的人名索引。

在本版中,我的讲座的法译本基于萨宾·波拉克(Sabine Bollack)的原译本。序言是由斯威特拉纳·塔米泰加玛(Svetlana Tamitegama)翻译的。我感谢多米尼克·塞格拉尔(Dominique Ségler)认真地校对了全文。我也感谢弗里茨·蒂森基金会(科隆),柏林科学院,在盖辛·波托姆利(Gesine Bottomley)领导下的图书馆里那些不知疲劳而能干的女合作者,以及迈克·沃尔特梅(Maike Voltmer)的大量日常参与。